

人类学视野下的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学成长阐释

侯胜川¹,高亮²

(1.郑州大学体育学院,河南郑州450044;2.南京体育学院期刊社,江苏南京210014)

【摘要】: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学的成长一直伴随着“中西古今”的路径争议,探究争议的源头,梳理民族传统体育学的成长历程有助于学科的健康成长。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考察了“土洋体育之争”投射出的中西和古今问题;研究认为,正是“洋体育”确立了“土体育”武术的体育身份,也为武术的科学化、教育化、专业化、团体化创造了可能,武术的科学化也促进了传统武术与现代体育的融合;研究发现,民族传统体育学成立至今存在的问题依然没有超越土洋体育之争,就人类学视野而言,也正是土洋体育之争所体现的“中西古今”推动了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成长;研究提出了民族传统体育学的核心议题:对人的研究,对生活方式的考察,对生命活动的考察,对历史文化现象的考察。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学;人类学;他者;土洋体育之争;现代体育

【中图分类号】:G8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656(2022)04-0088-10

DOI:10.15877/j.cnki.nsic.20220801.001

民族传统体育学作为体育学的二级学科,其合法性一直受到质疑,部分学者提出将之取消并置于体育教育训练学、体育人文社会学和运动人体科学之中^[1]。整体而言,关于民族传统体育学的路线争论沿袭的依然是中国学界“中西古今”之争的投射,甚至并没有脱离百年前“土洋体育之争”的范畴。现代化、科学化的认识在民族传统体育学科中表现出强大的历史惯性,但是学界很少关注这一历史惯性的源头。就人类学视角而言,成立于1997年的民族传统体育学将“中西”“古今”作为“他者”,人类学的“他者视野”为民族传统体育学提供新的解读,也为民族传统体育学的核心议题提供了方向。

1 民族传统体育学的成长简史

大体而言,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学经历了“武术专项→课程→专业→学科”由下而上的发展历程;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复杂性超越了任何一个学科的解读局限,它使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现代化、科学化过程中呈现出“文化刺猬”症候,处处是视角,处处是陷阱,造成学科主干单薄、涵盖面大、理论来源不清的困境。表现在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学术研究中是四处出击的“拿来主义”,

难以形成自身独特的研究范式和学科领地,使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知识碎片化,在学术话语上无法摆脱“学徒状态”,对其扭转面临巨大的历史惯性阻力。

由此,厘清民族传统体育中“武术专项”的前身为何,武术在何时成为“体育”,民族、传统、体育又是如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成为体育学的二级学科等元问题需要回溯至“土洋体育之争”。

1.1 “洋体育”确立了武术的“土体育”身份

就字面而言,民族传统体育包含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西方体育三者之间的交叉融合。所以,民族传统体育学的成长,一直伴随着“中西古今”之争,它又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土洋体育”之争的延续与深入。更进一步,20世纪30年代的“土洋之争”又是20世纪20年代“中西体育”或“新旧体育”之争的延续,其结果是中国最终获得“建设民族本位体育”的共识^[2]。改革开放以后,中西体育的路向

收稿日期:2022-03-30

基金项目:2022年河南省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项目(2022XWH155);2021年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21-ZZJH-392)。

作者简介:侯胜川(1980—),男,河南洛阳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传统体育,体育口述史。

通信作者:高亮(1976—),男,安徽六安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体育锻炼与健康。

之争夹杂着古今之变以及现代化、科学化的内容,使得武术最终成为体育学的二级学科,并逐渐发展壮大。在很大程度上,“土洋体育之争”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它还促成了作为外来文化的“体育”向着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中国体育”的过渡^[3],奠定了以武术为主干的中国本土体育的“体育”身份,为60年后民族传统体育学成为体育学下的二级学科做好了铺垫。

1919年,鲁迅、陈独秀等社会精英对马良倡导的《中华新武术》极尽冷嘲热讽,将“新武术”归结为清末的义和团运动之流。实际上,陈独秀反对的是“医家、拳术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道术如何养神如何练气方‘与天地鬼神合德’方称‘艺而近于道’的风气”^[4],他依然认为“拳技亦有独立之价值”。1929年,徐调孚在给江绍原的信中邀请其依据“科学”对国术加以批驳。但其时的社会精英并不反对武术的固有健身价值,反对的是依附在武术、中医身上的“旧文化”。对此,精武会创始人之一的陈铁生强调“拳术者中国式之体操而已”^[5]。陈铁生的辩护避开了批判者的“旧文化”说辞,将武术划归中国式的体育,事实上,当时的各种体育组织以及后来的中央国术馆也是将国术(武术)朝着体育方向发展。客观而言,新文化与旧文化之争给武术为主的民族传统体育提供了“前文化”与“后文化”比较的起点,既为后来的现代武术与传统武术之争埋下伏笔,也为武术的发展提供了参照。

土洋体育之争在对待以武术为主的民族传统体育方面提出了类西方体育的“体育”概念,盖定了武术的体育身份,表明武术界精英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下,尽可能地坚守中国武术的自身价值,极力寻求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的契合点,为中国武术寻求新的出路。

1.2 武术的科学化促进了“传统”与“体育”的结合

土洋体育的争议中,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养神练气等传统理论被称为玄学,与新文化倡导的科学格格不入,由此产生了“中国以前的武术,是散漫的,没有规则和系统的,是不科学的”认识,需要“改良它的动作,使它的动作合理化”,从而将武术对接“数学、重学、力学、生理学、心理学”^[6],武术的科学化也因此纳入武术界的视野。中央国术馆的发起者张之江大力倡导“国术的科学化”,当时出版的书籍

《科学化的国术》《科学化的国术太极拳》《国术与健康》等都明显的表示出对西方科学的认同以及对传统武术的客观认识,武术的科学化表现出中西融合、新旧杂糅的特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章乃器于1928年出版《科学的内功拳》一书。章乃器并非抛弃传统的武术理论,而是用物理学和生理学概念进行阐释,如用呼吸、循环、细胞、乳酸、物质代谢、内分泌等概念解释后天、先天、回复先天、无极、混沌一气、阴阳未判等传统武术理论。无疑,章氏“以科学方法整理文化遗产”的意识更加理性^[7]。在“土洋体育之争”白热化的时期,将“内功拳”这一极具旧文化色彩的术语与科学化相提并论并较好地融为一体,本身就是一个创举,也为后来“传统”与“体育”的结合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1.3 武术的体育属性及科学化方向推动了教育化与专业化发展

“土洋体育”之争的后期,伴随着“土”体育一方“中华新武术”的销声匿迹,代而取之的是中央国术馆的崛起,尽管中央国术馆成立早期也产生了武术门户之见等“旧文化”弊端,但在后来的改革中,其利用机构设置、教材编写、专业课程、人才选拔、专业期刊等方法培养了大批的武术人才,相当一部学员进入大中小学任教,其中张文广、温敬铭、刘玉华等中央国术馆学员后来成为各大体育院校武术专业的开拓者。中央国术馆已经初步具备现代体育大学的雏形。实际上,中央国术馆于1933年在南京创办了“国术体育传习所”,次年改名为“中央国术馆国术体育专科学校”,1936年再次改名为“国立体育专科学校”,后于1941年迁至重庆改名为“国立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从校名的变迁来看,其办学目的是培养兼具体育与武术特长的教师。由此,大批的武术师资进入中小学进行“体育的武术”教学,部分民间武术名家如李存义、李雅轩、刘凤春等也受聘大中小学任教。这也是张之江“以学校为基础,向全社会推广”“觅取中国独有的体育之道”^[8]武术发展政策的具体实施。客观上,武术的学校课堂教学促进了武术团体教学训练的方法形成,也促进了传统武术训练的科学化和教材的体育化,也是对“国术不系统、无统一规律,不合于体育目标”,不能使全国民众团体化练习以致强健体格,“更不便于全世界的普及”等批判的回应,确立了以武术为代表的“土

体育”的规范化、标准化、团体化、专业化方向。

1.4 “土洋体育之争”的本质与延续

“土洋体育之争”的本质是中西、古今之争在以武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路向的具体化。客观而言,“土洋体育之争”中正是因为批判一方的存在,促使了武术的体育化与科学化、教育化、专业化发展,也为此后武术专项、课程、专业、学科的形成与成长奠定了方向与基础。

因为武术是建立在“玄学的中国特有的‘生理学’”上的,即徐调孚指出的“丹田、太极拳、五行”^[9]之类的基础上,因此催生了下乘国术需要摒弃,上乘国术需要科学化的“他者”思路。褚民谊认为,国术中的如猴如虎的姿势只是为了引人注目,实则毫无价值,属于国术中的下乘,基于此,才应该“设法矫正”,而国术中的“柔软拳术”虽属上乘,但需要“把它科学化”,以“重力学、心理学,讲究生理卫生,突出规律与方法”,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国术才能“发劲、养气”,既科学化又合于体育。这一思路在改革开放后得到更为全面的延续,部分学者运用解剖、生理、生化等方法对传统武术动作进行生物学分析^[10],如田金龙的《太极推手三种发放技术的生物力学比较研究——兼对〈打手歌〉和〈四字诀〉的力学原理破译》(1994),朱东的《武术劲力探秘:形意拳崩拳动作分析及效果评价》(2014)、《陈式太极拳掩手肱捶动作技术的比较分析》(2014)等,此类研究将传统武术修炼中的经验型、整体型、现象型研究对象化为细胞、肌电、功率的研究,将之图表化、数学化、可测量化、影像化,可谓是《科学的内功拳》在新时代的延续。

1932年8月13日,天津《体育周报》发表匿名文章“体育何分洋土?”文章认为无论是“兴土废洋”还是“兴洋废土”都是“病态的”^[11],这一论断颇有高屋建瓴之意。改革开放后的武术发展中关于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现代武术)、民间派与学院派等争论依然没有脱离土洋体育之争的范畴。时至今日,在西方体育价值观主导的背景下,马廉赓认为“重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体育,必须要首先恢复中国传统身体文化的价值判断。”^[12]他认为本土体育只有除旧布新,找准自己的文化本位,充分认识现代体育,双方都不可或缺,“不但需要建立与西方体育价值相并行兼容的一套文化标准,更需要我们对于

前人所取得的成就予以正名与肯定”。就人类学视角而言,我们还需要从中西古今之争的“他者”视野出发,重新认识传统体育,并跳出传统体育的窠臼,使民族传统体育学的成长之路更为广阔。

1.5 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形成

沿袭“体育”成长路径,武术在1949年进入校园后经历了“武术专项→课程→专业→学科”由下而上的发展历程,在1997年由“武术理论与方法”拓展为“民族传统体育学”。然而,对学科的命名却意味深长,强调“民族”盖定了学科的历史地理范畴,而“传统”与“体育”则形成明显的对立关系,表明了学科既要延续由“土洋体育”之争确立的“体育”属性,还要彰显“本我”的传统特点,包含了“中”“西”“古”“今”等4个维度,这一矛盾性的命名方式并非欠考虑。民族传统体育学下的专业设置为武术套路、武术散打、中国式摔跤等3个方向,其二级以上运动员的招生条件也决定了竞技体育的人才培养路向,由此作为另一线路的传统武术只能走向民间,引发了民族传统体育学中长达20年关于传统与竞技方向的争议,其本质并没有脱离中西古今之争的范畴。

由于民族传统体育学科来源于武术专项,所以这种自下而上的学科建设路径决定了学科在一定时间内必然要遵循武术的“体育”惯性,同时,由于对现代化、国际化的追崇,“主流”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学术问题一直围绕“申奥”、国际传播展开,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低头凝视学科的“民族”与“传统”。由此,民族传统体育学的专业建设、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等方面都表现出强烈的西方体育学移植问题,从而导致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学术问题研究难以有效解决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现实问题,也表明学科的整合力与解释力不足。时至今日,民族传统体育学科成立25年来,并没有发生大幅度的变化,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难以契合当前的国家社会发展,三大体系的建设已经迫在眉睫。

2 人类学“他者”视野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启示

2.1 人类学视角与方法为民族传统体育学的成长提供的经验

欧美人类学家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寻求其他文明的生活方式来克服自我社会理论的限制,这种研究

方式被称为“他者的目光”,民族传统体育学当然需要“他者的目光”,从“非我族类”中提炼理论的洞察力来提醒“本己的目光”,避免本我的民族中心主义眼光的局限。在以科学为导向的西方体育学科的“普遍解释力的概念”影响下,民族传统体育学如何推出普遍解释力的概念,这种新的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从哪里获取,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学是否生来具有,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传统坚守”是否就能避免学科话语支配的地位?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追寻,需要从“包打天下”的人类学寻求解释。

研究者曾将武术的研究范式概括为以中解中范式、以西方生理学和解剖学为基础的生物学范式、以西方社会学理论为基础的社会科学范式^[10]。表面而言,坚持“武术文化自主性阐释”的“以中解中”范式仍然停留在大而言之的呼吁阶段,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方法论抱负,单凭对“文化模仿”的抵制难以产生令人信服的自身文化优越性证据,甚至会引起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坐而论道、华而不实的虚无主义;当前的民族传统体育学成长不可能用简单的“去西方化”进行情绪化的表达,李金铮在讨论历史学的方法论时认为“那些主张去西方化的学者,不是一直有意无意地使用众多的西方术语吗?”^[13]

“文化的互为主体性”被视为人类学的天职,人类学家通过对“他者”的研究以“非我族类”来反观自身,达到“以人推己”的“他山之玉”效果,换言之,对以奥林匹克文化为代表的西方体育学考察,进而“关注自己在一个‘非我’的人为世界中的自我形象”^[13]。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格局^[14],对应的则是人类学的文化互为主体性,试想,如果没有古代夷、狄、蛮、戎等“他者”,如何会生成中华、华夏、中原等“自我”称谓。所以,从人类学的视角关注非西方的、简单的、传统的甚至是原始的我国不同民族群众最基本的生活层次,透视其受到的约束和享受的自由,体会那种“道可道,非常道”的陌生感,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接受一个遥远的地方和时代的“他者”的拷问,进而产生一种“油然而生的认识论和价值观的移情”^[13],这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学成长所亟须的经验。

2.2 民族传统体育学不自觉地将西方体育学作为“他者”

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的设置显示了“确立者对于

该学科内涵丰富性的一种期望,希冀其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融合”^[15]。显而易见,体育学下属4个二级学科的分类并不符合“无遗漏,不交叉”的基本原则,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民族传统体育学应进行分解重组。就当前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研究内容而言,基本涉及一般传统体育项目的教学、训练、竞赛、传播及历史文化方面,分别包含了体育教育训练学、运动人体科学和体育人文社会学,所以部分学者对其“重组”提议并非空穴来风。对比民族学、民俗学、文化学等其他母学科,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学应该涉及的是不同民族的民俗、生活方式、文化哲学以及包括原始巫术的人类学等学科内容,所以,当前在体育学科下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难以形成关于自身的高深学问,进而形成迥异于西方体育学的学说进而产生鲜明的学派。

客观而言,民族传统体育学在对西方体育学的学科移植过程中产生了“陌生感”,但是这种本以“他者目光”对民族传统体育学进行自我反观的“陌生感”并未产生应有的客观认识,而是产生一种落后、陈旧、不科学的摒弃之感。另一方面,在保守学者眼中,任何对民族传统体育学有关民族的、传统的内容批判都会心生不快,甚至升级为自尊心层面而大力批驳。当我们急于对现代性进行模仿时也加快了对传统的神化,从而丧失了对“他者”在场的宽容,由此形成了学科建设路线的二元对立。就“土洋体育之争”的历史经验而言,关于民族传统体育学的认识不断地在“否定之否定”,甚至会重复此前的争议和认识。所以,正是与西方体育学之间所产生的种种纠葛为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定义产生了“他者的视野”,更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学科身份的确立。人类学去认识“他者”,便是一个跨越和解释这些边界的过程,也就是打破“己”与“异己”之间成见的过程。费孝通^[16]认为“由相同引路,着重注意其相异”,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研究需要重视以“已有的经验”作为参照体系,同“新接触的事物”进行比较,进而推己及人。换言之,现代性作为“他者”,是民族传统体育学利用西方体育学的科学手段来复活昔日世界的一种方式,民族传统体育学捕捉西方现代性的知识与权力来增加自己学科的文化力量,同样,西方体育科学作为“他者”为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复兴提供了可能。

“学科本土化过程可以看作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进入的一种应对方式,当中国人从西方人那里学到这些学科的知识之后,一种深埋内心的对于母文化的感情使其选择做出了对于这些外来学科进行改革的尝试。”^[17]无论是人类学本土化过程中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关注,还是体育学本土化过程中对母文化的感情,民族传统体育学都可以从二者的“非我”中看到“自我”,人类学和西方体育学都可以作为民族传统体育学“他者”的自我镜像,从而提供一种认识自我身份和形成自我文化自觉的路径。

2.3 “古为今用”是民族传统体育学成长的有力支撑

21世纪以来,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解释力不足^[10]而无法应对日渐频繁的民间武术乱象^[18],以至于关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伪科学”的批判卷土重来,似乎又回到100年前的“土洋体育之争”,单纯地用以往的理论事实解释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显然,民间武师对自身竞技能力的自证所产生的武术文化危机也波及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整体声誉。对此,路云亭^[19]将民间武师无视竞赛结果的态度归结为原始的巫术思维,并引申到义和团时期戏仿关公骑马冲击教堂被洋教徒快枪打死的教徒事件。在弗雷泽^[20]看来,巫术与科学在认识世界的概念上是相近的,它们都认为事物的发展完全有规律可循,且可依据这些规律进行预见和推算。所以弗雷泽认为简单将一切巫术当做“荒谬和无益”是“多余的老调”。

人类学家关注的“离我远去”不仅仅是地域概念,对“我”的考察还包含着时间概念,反映在武术上,是“古今”“新旧”关系的处理。在土洋体育之争时期,那些栖身于武术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包含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制度性传统,并非情绪性的批判能够剔除。近代产生的人类学对“我”的关注无法脱离现代性的自我反观。因此,针对生活在现代性的“我”,人类学家就不得不从边陲地区、边缘群体的“地方性知识”入手,考察他们与现代世界不同的小世界,进而熟悉和体会他们的“小传统”的力量,从而才有可能反观“我”所在大世界的“大传统”。抛开西方学者惯用的文明/野蛮、传统/现代、落后/先进的二元视野,对“过去”作为“他者”的“小传统”考察,关注的是现代的观念体系,这是人

类学另一种时间性的文化互为主体性。就这一视角而言,民族传统体育学25年空耗于对“古今”相对应的“现代”和“传统”以及“中西”相对应的西方和东方的“地方性知识”的优劣、意义之争。传统文化是理解中华民族在千百年的日常生活中如何创造了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并如何满足他们种种需要的工具,传统体育活动作为非制度性的“小传统”恰恰反映了社会、国家、民族成为正式制度的“大传统”。传统武术中的师徒伦理、门户之见、成规戒律等等小传统隐藏了宗教、宗法、儒学等内容,它会产生“不懂武术无以知中国”的连锁效应,并进行“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古今比较,进而才可能对困扰现代性的生态危机、文明冲突、生命现象等问题进行创造性和想象性的思考。笔者所调研的福建省会城市近郊乡村的端午龙舟祭中包含了一般意义上的娱神、娱人、娱己的功能,还包含了乡土社会解体后,唤起集体记忆以维系村民集体意识的文化传承功能。因此,那些民族传统体育中看似不起眼的“小传统”折射的是“一个无形层面支撑着有形层面”的“大传统”。

3 人类学视角下民族传统体育学成长的核心议题

民族传统体育学的成长当然会遭遇中国人类学“传统与现代、人文与科学、客观的科学描述与主观的国族建构交杂的状况”^[21]的问题。倡导社会学想象力的米尔斯^[22]认为“所谓‘科学’只是一种自命不凡的弥赛亚”,其身份在现代社会中相当暧昧。格尔兹^[23]认为并不存在传统到现代的简单进化过程,那种假设现代化取代本土化,现代取代传统的假设无法简单地套用在社会的发展之中。

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服务人类自身,其研究对象的核心总离不开一个大写的“人”字^[24]。就人类学视角而言,它通过追求历史的深度和文化的相对性来阐释人类生活的可能性,进而反观现代文明的存在问题,以期问题的解决提供反思,其中就包含了大量的“非正式制度”,这应是民族传统体育学所应关注的核心议题。

3.1 作为一项对人的研究

人类学是对人的研究^[25],致力于“将人视作有内涵的完整形态”^[26],关注人的身心与身外之物的关系以及人的“活生生的社会存在”^[26]。不同于物的研究,“把所研究的对象看成身外之物,而且还要

能令自己是人的这一特点,设身处地地了解这个被研究的对象^[27]”。钱穆认为你面对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人生不是行尸走肉,“走进解剖室的训练和习惯对活泼的人生无用”^[28];在人类学家看来,相对于隐藏在人背后的文化,个体的差异是肤浅和表面的。程志理对鄂西的调查中发现一种拍打全身的舞蹈,实际是当地人将拍打蚊虫动作演化出的一种身体活动;当田野工作者惊喜地发现一种稀有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时,对当地人而言不过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情景再现,而且这一看似惊奇的身体活动现象几乎是全人类所共有,但并非都能升华为文化现象。因此,人类学的主张不在于实现自然科学实验的重复性,而是对人的特有文化现象的诠释与解读,从而使研究者以“他者”的身份和视角理解自身的文化行为,在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上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用理论和问卷指导研究过程”的“实验理性”^[29],避免研究中的“人为事实”转化为“生物事实”。因此,用人类学的“实践理性”考察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象,通过对“小地方”的体育文化现象和运动行为的分析与“大社会”的联系与思考,通过地方族群的“小传统”反映国家民族的“大传统”,所有这些都集中在一个“大写的人”身上得到集中的体现。

以民族传统体育学的主干内容武术为例。武术练拳更是如同演戏,像看戏一样看自己的刚柔缓急与冷暖,追求“意大于形”,用心之法在于“身心分离”^[30]。太极拳用意不用力、形意拳打人如割草等武术箴言体现的是人的意识行为,练拳是一个“意识人”的活动,由此产生了中国武术独有“心法”内容。习练过程会感受自己的渺小,如同人在高山大川面前油然而生的敬畏之意。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应用面更加广泛的民间武术将身体作为求道的中介,“离开己身,无物可求”,进而将身体以“结构”的形式划分为五体、上中下盘、一身七拳、一身备五弓、内三合、外三合、上下相随、三节四梢、内外合一、节节贯穿、筋骨皮等,并在练拳过程中以“内似金刚,外示安详”的身体以情绪化而成为情本体,从而形成不同拳种、风格和流派,体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与艺”的中国传统体育价值观,实现对人的教化^[31]和成长^[32]。

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身体场域中,没有从生

理解剖层面微观化为细胞等概念,尽管对气的运行也有“筋骨要松,皮毛要攻”“入骨入血”的要求,指的是人体感觉如同动物在受惊瞬间的“炸毛”时的毛孔闭塞,使元气回流而不至于外泄,说的是身体瞬间的暗劲积蓄,不同于西方生理学的细胞学说。所以,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的“人”的身体研究,机械化解剖的躯体是无法解释人的本体认识以及在认识基础上衍生的伦理、风俗和制度等人类特有的文化产物。基于此,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奠定了它“大写的人”的学术路向。

另一方面,民族传统体育学科之下的专业课程教学中的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化学、运动解剖学以及运动心理学课程的设置与习得,表面是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离我远去”,但是,站在“他者的视野”中对民族传统体育学自身的学科体系构建进行自我的反观,它又是学科成长必需的“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换言之,也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学经历了“武术专项→课程→专业→学科”由下而上的发展历程,它才能在系列现代化的“非我”中看到“自我”,继而认识自我并形成文化自觉路径的可能。所以,民族传统体育学正是从西方体育学的“人体”研究中看到了自我“人”研究的镜像。由此,人类学的视角暗示了民族传统体育学科成长历程的必然:学科移植→自立门户→学科交叉。令人欣喜的是,承接体育人类学的发展脉络,戴国斌^[33]提出了武术人类学的议题和方法思路。

3.2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考察

“现代”一词背后隐藏着对日常生活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设置了一种意识形态陷阱,使人们产生“现代”的生活方式才是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进而区分了野蛮与文明的界限。“现代化”在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学者帕森斯、罗斯托等提出,旨在将现代化等同美国化,“现代化作为一种认知框架,通过这一架构,美国对自己的民族特性、使命和世界角色所达成的理解具有了更丰富的内容,并且广泛流传”^[34],进而极力号召发展中国家进入“现代化”,形成新的文化殖民。人类学的研究与此相反,对现代生活中淡化的、不理性的现象进行考察,关注日常生活的“常识”和隐藏的东西,包括对以前衣、食、住、行进行时间和空间的跨文化比较,进而反观“现代”的时代性和局限性,因而超越了“现代”。

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本身就是生活化的,体现为“扫洒应对,皆成文章”“砍柴挑水,无非妙道”的生活化场景。先人通过“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易经》)的探索与实践,发现“道始于一,一而不成,故分为阴阳,阴阳和合而万物生”(淮南子·天文训)的自然规律,藉以“通神明之德”与“类万物之情”,进而将自然抽象为阴阳、八卦、五行,在生活化的民族传统体育中生成克敌制胜和养生休闲的太极拳、八卦掌、形意拳等。北方农村冬天常见的扭秧歌、划旱船、踩高跷、舞龙舞狮以及南方夏天的划龙舟、泼水节等活动都与当地居民的生产劳动、生活节律紧密结合。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通过“道法自然”的价值指向,从“以工为美”的修炼到“以拙为美”的返璞归真^[35]。作为一种求生保命的综合实用技术,中国传统武术的社会基础是“现实生活的伦常日用”^[36],追求“拳本无法,有法也空”。中国武术器械中的板凳、桌子、锄头、斧头、扇子、剪刀、算盘、梳子、钩子等都是劳动和生活中的常用工具。作为生活经验提炼,乡土社会中任何生活方式都是经验的产物,以至于后人“不必知之,只要照办”即可,前人所用解决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为自己生活的指南^[37]。

南方地方村镇流行的端午龙舟祭以及贵州侗族的“抬官人”活动,都具有明显的巫术、舞蹈、武术色彩,是先人为了通神明、类万物的“交通手段”,到现代社会后,尽管这种意识有所减弱,但是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仍然延续了下来,“多位寨老与村干部提到,办‘抬官人’的目的就是好玩、有意思”^[38]。人类学研究并不主张令人难以捉摸的玄学理论,而是将“人之常情”视作人与万物之间相互的依赖关系,是老百姓的伦纲日常运用。民族传统体育不同于“开大战”“对大敌”的军事武艺,它将不同族群的日常生活、生产劳动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包含了各自长期以来生成的生态体系、衣食住行、物质文化、社会组织、风俗习惯等“土著思想”,在天地之悠悠中“闲来时造拳,忙来时耕田”。又因为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日用而不知的常识性活动,所以相对于西方竞技体育立竿见影“更快、更高、更强”的锦标精神,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似乎格格不入。伦理化的民族传统体育的绿色、生态特征恰好可与西方竞技体育产生互补作用,它追求的并非一般意义的实际效

用。“东方民族的传统身体运动文化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具备休闲时代满足人类多样化、个性化、生活化的需求,东方体育是返璞归真的最佳选择。”^[39]

3.3 作为一种生命活动的考察

近年民族传统体育学中流行的口述史研究中,针对某一事件、人物、时刻、口头传说、现象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取得了一手的鲜活资料,对我们理解、阐释民族传统体育提供了新的参考。武术家访谈录^[40],普通群众的太极拳锻炼口述^[41],民间武术馆校的传播活动^[42],发达国家的海外民族志^[43]等口述研究对特定事件进行了深入的文化阐释,补充了“文献里的田野工作”资料,使后续研究能够与“故人对话”,从而使人类学家能够在空间和时间上产生“他者”的视野。由李仲轩口述、徐皓峰整理的《逝去的武林——1934年的求武纪事》不仅是一个民国形意拳人的传奇武术人生,更是披露了古人守信的武人风骨、保家卫国的国术精神、武术工艺层的真传一句话、鲜活真实的民国武术史,等等。纵览全书,表达的是李仲轩的生命哲学和生命文化,由生活武术化转而武术生活化,阐释了民族传统体育所连接的人的生命、生活、生存万象。

作为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中国武术在传承与传播方面充分“伦理化”,将习练者与拳种、门户、门派、国家连接起来,从养生之技、技击之术到人生之学,呈现了中国儒家文化中“家、国、天下”的情怀。“拳道之大,实为民族精神之需要,学术之国本,人生哲学之基础,社会教育之命脉。”^[44]在王芃斋看来,如果练拳使身体畸形发展则是“戕生”“拳术首重养生”“拳者养为一,练为二,用为三”^[45]。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在民族传统体育中“首先是‘生命体’的利害得失而不是‘物自体’的真假对错”^[46],通过知行合一和身心合一“维护自身个体和群体生命”,体现出“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生生不已。

为此,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中配套了专门的武医伤科,近代武术大师万籁声、郑怀贤都是能武能医的代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产了独有的仿生系统,表现出对动物技击、养生、游戏的模仿^[47],张再林^[41]认为而这种“仿生”和“返祖”,是人们对鸢飞鱼跃、猿啼虎啸的动物世界、丛林世界的重返和复归,以一种失而复得的方式切身体会生命之所以为生命的那种天机、真髓。由“吹呵呼吸吐故纳新、熊

经鸟伸、为寿而已矣”(《庄子》)而衍生的五禽戏、以及武术养生中的龟息都非个例,在《尚书》《汉书》中也多有猿猴舞、雀鸟舞、熊舞、象舞、沐猴舞等象形养生系统。概而言之,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是在日常生活中寻找生命的真谛,甚至是通过巫术的“相似率”从自然万物中的长寿对象中寻求生命的滋养,以生命技艺践行为生活方式的高度统一。所以,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研究议题需要从人的生命活动中探究先人体育活动的真意,重视体育现象背后的文化心态,从体育活动的发展中看出文化性格的常与变,并设法与社会的整体结构取得联系。

3.4 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的考察

实际上,我国很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仅仅是一种身体文化活动。在人类学看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表达的是“一个体系由周而复始的年度周期和生命周期维系,使一个地方具有一个地方的一体性和总体特征,不同的人群生活于自己的宇宙观模式之中”^[26]。

“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哲学的核心思想,指导了中国人的文化实践。体现在民族传统体育当中则是“坐卧行走,不离这个”。“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地万物之始,即吾之始;天地万物之终,即吾之终”“道法自然”等先哲圣言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一套仪式性的演练准则,充满了文化表演的意味。在民族传统体育中,因武术的“杀敌保命”价值而备受关注,它的习练过程充满了对生命的敬畏和文化的仪式感。八卦掌要求“须择天时、地利、气候、方向而练之”;少林拳“每日早起练拳之先,必面向东方”;形意拳主张春季主练肝,夏季主练心,秋季主练脾胃功,冬季主练肺功;并以五行生克之理对应横拳生劈拳、劈拳生钻拳、钻拳生崩拳、崩拳生炮拳、炮拳生横拳的循环往复,进而产生劈拳克崩拳、崩拳克横拳、横拳克钻拳、钻拳克炮拳、炮拳克劈拳的习练法门。又如少林龙、虎、豹、蛇、鹤五形拳法称为少林五拳,素有“龙拳练神、虎拳练骨、豹拳练力、蛇拳练气、鹤拳练精”(《少林宗法图说》)之说,“人之一身,精、力、气、骨、神五者,必须交修互练,始可臻上乘神化之境”。鹰爪拳要求手掌必须面对太阳,粤北门在穴位点打救治有着严格的十二时辰规定,从而会产生对救治和打击截然不同的效果。

事实上,笔记所采访的民间武术家中,他们并不认为五拳与五行之间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他们也无法说明练习方向、时辰、地点的不同是否会影响效果,但是,他们在练习当中仍然坚持祖传的神圣,并视为传承真理来追求生命的真意。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关于时间、空间的严格规定化为“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闭关修炼的坚韧执着,古人将人体、伦理、风俗、习惯、练习、修养对应宇宙的自然运行,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另外,清末最为著名的直、东义和团事件中,神拳、治病、幻术、武戏、神打、侠义、尚武精神、符咒、社戏、秘密结社等华北戏巫文化的结合体,其仿戏及降神附体仪式合力构成了民间和江湖文化的重叠性主体^[48]。以至于柯文^[49]认为“义和拳”的“拳术”(Boxer)与西方人心目中的“拳击”毫无关系,国内外热衷于研究义和拳的学者都不将其作为一个民族传统体育事件,它反映的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地方文化风情,但是义和拳确实作为一个重要媒介深陷其中而不得不进行考察。因而,考察作为民族传统体育的神拳、义和拳、梅花拳、阴阳拳等武术流派的传承发展脉络,就不能脱离地方性的民俗文化风情,还要有强烈的“他者”意识,认识到“巫术作为谬误之子和自由与真理之母”^[20]的两面性,才能从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中梳理其中的“体育”线索。

弗雷泽将原始人的巫术称为交感巫术,并按照“相似律”和“接触律”将其分为顺势巫术和接触巫术。弗雷泽认为这是先人通过类似和接触联想简单的认识自然的思维过程,是最初的科学,因为“巫术和科学都认为自然的进程不取决于个别人物的激情或任性,而取决于机械进行的不变的法则”。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尤其是在民间流传的传统武术当中,巫术的影子依然大量存在,甚至出现了童子功、铁裆功等性别、身份、时辰、环境、药物的禁忌。单从西方体育格斗竞技的角度,我们会发现传统武术的实战能力鲜有建树,因此,个别民间拳师的拙劣技击表演会引发群嘲,并引火烧身至中国武术^[50]。实际上,这种民间杂耍式的表演自古就有,是对武术的碰瓷行为,不足以形成对某拳种甚至中国武术的整体评价行为。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再原始的民族都存在巫术,所有的野蛮民族都不缺乏科学和科学的态度”,巫术与科学都是人们解决问题的实际需要,在

科学尚未成熟之前,巫术提供了生产和交换的文化条件^[51]。所以,民族传统体育中的非理性思维是古人的一种朴素的自然观,对其考察并不能简单地视为科学和非科学,而应该是“他者”研究的历史文化现象^[52]。

4 结语

就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发展简史而言,其发展历程一直沿袭“中西古今”之争的4个维度,并形成了学科发展的特定问题,对其消解是学科健康发展的前提。从人类学的视角看,民族传统体育学应当形成自己的特定社会逻辑和宇宙观逻辑,以西方体育学为“他者”,获得自己的研究范式、风格和问题意识,将自身的特殊性作为学科的主要边界。由此,民族传统体育学需要采取更广阔的人文世界观来看待他者与自我,那些看似边缘的、视而不见的、日用而不知的、平淡的、无用的人文类型正是民族传统体育学观察研究的核心。但是,人类学视角的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并非要陷入对奇风异俗猎奇的俗套中,以“他者目光”的研究旨在形成人类学追求的文化的互为主体性,不仅使我们能从他人的视角看到自己,也能使我们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看到他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尤为重要。因此,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议题在西方体育学“技术”属性研究的“他者”视野下,需要转向我国不同民族的传统活动中来,通过中国人的体育现象链接人、社会、地方、国家、民族、文明与世界观念的综合可能,形成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学科边界,实现习近平在“517”讲话中强调“新时代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风格和气派”。

参考文献:

[1] 杨文轩. 体育学科体系重新构建刍议[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09, 24(4): 277-280.
[2] 熊晓正, 陈晋章, 林登轅. 从“土洋”对立到“建设民族本位体育”[J]. 体育文史, 1997(4): 13-17.
[3] 马廉祯. 论现实视角下的近代“土洋体育之争”[J]. 体育科学, 2011, 31(2): 76-84.
[4] 陈独秀. 学术独立[J]. 新青年, 1918, 5(1): 15.
[5] 陈铁生. 技击精武本纪[M]. 上海: 中央精武体育会, 1919.
[6] 万慕超. 国术科学化运动[J]. 国术半月刊, 1932(1).

[7] 张振华. 民国武术科学化个案研究之《科学的内功拳》[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20, 36(1): 54-58.
[8] 大公报社. 今后之国民体育问题[N]. 大公报, 1932-08-07.
[9] 江绍原. 民俗与迷信[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5.
[10] 侯胜川. 中国武术研究的范式危机与重构[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20, 37(6): 731-736.
[11] 体育周报社. 体育何分洋土[J]. 体育周报, 1932, 1(28): 1-3.
[12] 马廉祯. 论现实视角下的近代“土洋体育之争”[J]. 体育科学, 2011, 31(2): 76-84.
[13] 李金铮. 方法的内外互补: “中国史”学界的中国与西方[J]. 史学月刊, 2018(8): 8-13.
[14] 费孝通. 从实求知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5] 易剑东, 熊学敏. 当前我国体育学科发展的问题[J]. 体育学刊, 2014, 21(1): 1-10.
[16] 费孝通. 重读《江村经济·序言》[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4): 11.
[17] 孟航. 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18] 侯胜川. 拟剧理论视角下中国武术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J]. 体育与科学, 2020, 41(1): 78-83.
[19] 路云亭. 武术真伪辨: 对2017-2018年度武术危机事件的思考[J]. 体育与科学, 2018, 39(5): 25-32.
[20] J.G. 弗雷泽. 金枝——巫术与宗教研究[M]. 王培基, 徐育新, 张泽石,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21] 麻国庆. 社会与人民: 中国人类学的学术风格[J]. 社会学研究, 2020, 35(4): 174-193.
[22] C. 赖特·米尔斯. 社会学的想象力[J]. 李康, 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23]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7.
[24] 皮埃尔·布尔迪厄, 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论[M]. 李孟, 李康,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25] 谭华. 体育与人类学[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1986, 12(2): 1-5.
[26] 王铭铭. 人类学讲义稿[M].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9.
[27] 费孝通. 学术自述与反思[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28] 钱穆. 湖上闲思录[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0.
[29] 陈振勇. 人类学视野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的启示与思考[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5, 49(2): 44-47.
[30] 李仲轩, 徐皓峰. 逝去的武林——1934年的求武纪事[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
[31] 王岗. 质疑: “技击是武术的本质特征”[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9, 32(1): 28-34.
[32] 戴国斌, 刘祖辉, 周延. “锻炼行道, 练以成人”: 中国求道传统的武术文化实践[J]. 体育科学, 2020, 40(2): 24-31.
[33] 戴国斌. 武术人类学研究: 概念、议题与展望[J]. 体育学研究, 2021, 35(3): 1-10.
[34] 雷迅马.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M]. 牛可,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35] 张再林. 身体哲学视域下的中华武术与中华之道的合一[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9, 42(7): 9-16.

- [36] 阮纪正.至武为文:中国传统武术文化论稿[M].广州:广州出版社,2015.
- [37]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38] 谭广鑫,周志俊,许爱梅,等.巫风武影:南部侗族“抬官人”挖掘整理的田野调查报告[J].体育科学,2014,34(3):62-71.
- [39] 谭广鑫.原始武舞与巫术交融的武术萌芽状态[J].体育科学,2019,39(4):81-89.
- [40] 郭玉成,王琨,王培含,等.吴彬先生访谈录[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8,41(4):116-122.
- [41] 晁改英,戴国斌.太极拳锻炼空间的口述史研究[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1,35(5):64-67.
- [42] 侯胜川.一个民间武术馆校的传播实践考察:一项口述史研究[J].体育与科学,2017,38(4):71-77.
- [43] 龚茂富.美国“康村”武术的海外民族志研究[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8,42(6):69-73.
- [44] 李荣玉.走进王芑斋——解析大成拳[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 [45] 和振邦.大成拳术(第二部)[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4.
- [46] 阮纪正.武术——中国人的存在方式[J].体育与科学,1992(1):32-36.
- [47] 戴国斌.武术的仿生性生产[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9,33(6):6-10.
- [48] 路云亭.民间武术文化对直、东义和团事件的催生[J].体育科学,2012,32(6):90-97.
- [49] 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M].杜继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 [50] 侯胜川.厨会:一个民间武术门派的重生与发展叙事[J].体育与科学,2018,39(2):71-76.
- [51] BRONISLOW M. 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 and Other Essays[M].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48.
- [52] 高亮,麻晨俊,张道鑫,等.在场与出场:中国武术阴阳思想探析[J].体育学研究,2019,2(2):23-30.

作者贡献声明:

侯胜川:提出论文选题,设计研究框架,收集资料,撰写论文;高亮:提出修改意见及最终版本修订。

An Anthropological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Studies

HOU Shengchuan¹, GAO Liang²

(1.P.E.College,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44,China;2. Journal Editorial Department,Nanjing Sport Institute,Nanjing 210014,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China's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the path dispute of "Chinese or western elements, ancient or modern styles". Exploring the source of the dispute and combing the growth process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will contribute to the healthy growth of the discipline. Using literature review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roblems of Chinese or western elements, and ancient or modern styles in the choice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foreign sport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it is foreign sports that established the sports identity of Local Sports Wushu, and also created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scientific, educational, professional and collective development of Wushu; The scientific growth of Wushu also promotes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Wushu and modern sports.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problems emerged ever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raditional sports studies still whirl around the choice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foreign sports, with the path dispute of "Chinese or western elements, ancient or modern styles" actually promoting the growth of traditional sports studies from the anthropology perspective. Finally, the research puts forward the core topics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including research on people, the investigation of life style, the investigation of life activities,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henomena.

Key words: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studies; anthropology; introduced party; choice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foreign sports; modern sports